

现代生活的绘画

——从马奈及其追随者的艺术看巴黎

■ (美) T. J. 克拉克 / 曹程译

[摘要]: 本文是美国著名艺术理论家、批评家T.J.克拉克同名著作修订版的导论部分,探讨了印象派绘画与巴黎的关系。

[关键词]: 印象派绘画; 巴黎; 马奈

这本书探讨的是印象派绘画与巴黎的关系。如此切入自有缘起,据我所知,早在1937年1月迈耶·夏皮罗就发表了几段相关论述,初载于命数不长的《马克思主义季刊》,其中写到:早期印象主义的力量之源,未止于对笔趣画意的热衷,亦不单是对阳光色彩的尚求,马奈及其追随者的艺术中还有一种鲜明新异的“道德眼光”,其作品昭示出的视觉真实与一类社会自由相接榫:

“早期印象主义……具有一种道德眼光。它发现了一个瞬息万变的户外世界,观看者在其间往来悠游,位移无定,眼见的形态也因之变幻无常。这当中潜藏着对社会和家庭礼俗象征的批驳,或至少有悖逆旧习的风范。早期印象派的画家投身在这个世界,尽情描画人们的社交生活,留下了蔚为大观的作品,其中有清晨茶点,有草地野餐,有兜风散步,也有游船漫游和假日旅行,都是一派随心所欲、无拘无束的景象。这些怡人的城市图景展现出19世纪60~70年代资产阶级的休闲娱乐,不仅如此,它们还藉由绘画主题和审美技艺的全新选择来反

映创作理念,即认为艺术纯为个体享乐之地盘,不涉及其它观点和思想。对一个受过启蒙思想熏陶的资产阶级成员而言,养成图景中的趣味好尚势必要脱离其所在阶级的正统信仰,由此体现出他拥有的最高自由。新的画法真实再现了他周围那个气象万千的景观世界,流连在其中,这个思想先进的有钱人体验到环境的变迁和市场的流转,以及工业发展的日新月异,而这工业于他既是财路也是自由之本。当他面对着新印象派的画艺,看到世界破碎成差别入微的色点,眼中满是稍纵即逝的景象,里面的种种况味,虽然来得有些陌生,却十分贴近中诚信步者和奢华消费者的心态。

过去,资产阶级的社交活动在社区、家庭和教堂中进行。环境变迁后,人们开始游逛大街、泡咖啡馆、去度假地,社交有了乘兴随意的氛围,还染上了商业气息,个人的自由意识也随之渐远了旧有的社会关系。一些中产阶级成员向往新的自由,可又缺乏获得它们的经济手段,所以身在茫茫人海,内心常有孑然无助的苦衷。进入80年代后,乐活的人已淡出印象派的创作,画布上只余下幽僻的自然景观。到了新印象主义时期,人的形象又被重新竖立,甚或夺人眼目,如若碑石。这些社会群落被分解作相互孤立的看客,要么彼此默然失语,要么跳着呆板重复的舞蹈,姿态中规中矩,鲜

有即兴灵动可言。”

引文中的理由和结论衔接得有些蹊跷,我且能挑出部分纰漏。例如,说资产阶级因其生存实态而喜爱印象派的作品,并乐于从画中看到他的日常经历,这无疑是高见,但我以为这个观点顶多只是个隐喻,毕竟我们对印象派最初的了解还无法将其确凿证实。同理,夏皮罗并不清楚当时的资产阶级,或至少是其中受过启蒙的成员,是否真的欣然于那种“随心所欲,无拘无束的社交生活”,也不清楚那些“乘兴随意、沾着商业气的娱乐形式”是否真的是到后来才显出孤立和疏离的特征。依夏皮罗的看法,我们不妨追问:马奈在《草地上的午餐》里描画的社交生活,那其中到底有怎样一个乘兴随意?再问莫奈的同名作品,既然对衣着新风表现得如此尽心,为何又搭进一个仆人(身穿仆人装?),还一副拘谨谦卑的模样缩在树的别侧?

当然,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异见,夏皮罗的《抽象艺术的品性》毕竟只是篇随笔,不必吹毛求疵。而且在印象派的相关研究中,我看唯有这几行短论可谓上佳,诚因作者分外有力地提出:这种新艺术的形式离不开它所表现的内容——19世纪60~70年代的资产阶级所享有的那些真实的娱乐形式。

此见解正是本书的缘起。读者会发现,为了把这一问题讨论得细致,并试图对隐喻和提议做出些许超越,我将在论述中反复用到四个术语——阶级、意识形态、景观和现代主义。若直接给出他们的定义可能会助于认识,但也可能流于含混,或者引起不同程度的争议。四个概念定义起来都有麻烦,第一个尤为棘手,因为均要涉及到社会性质之类的问题,会牵出一连串甚是空泛的主张,更别提还有多少陈词滥调。困难如此,我仍愿勉力前进,但先得附上一个硬性条件,就是我所遵循的定义必与文中凡举之例证紧扣着来理解,否则就不足为训。

可以说任何一种社会秩序其首要内涵都是对阶级的划分,此乃常理。我们对“社会”一词的认识无外乎一套服务于“团结、距离、归属和排斥”的手段,其存在极大地促成了物质生活的生产,并为社会制定出一种秩序,使身在其中的男男女女不仅能谋得生存,还能有信心将这种生存延续下去。在我看来,构成这种秩序的中坚力量应该是“各种表征”或“符号体系”;用“等级分明的表征体系”来描述“社会构成”的概念并不会使其变得琐碎平凡,也不会套之以唯心主义的外衣以至悖反唯物主义。这样做是为了避开庸俗唯物主义的可怕陷阱,后者将社会构成的基础都归于经济生活所决定的实际,以为它们比符号系更加坚固牢靠;实际上这种观念在解释问题时总会处处碰壁,我要做的就是绕开这些障碍,另辟通途。一方面仍有必要坚信经济成分对社会有决定力量;另一方面,为了实践这个理念,我们还要相信只有穿透符号和习

俗的纹理,认识才能够抵达事物和行为的基石。经济生活的名目繁多,如经济体、经济领域、经济圈、经济层、经济阶段,凡此种种,其本身都是充满表征的领域。就拿货币、商品样式和工资合同来说,难道我们还有别的方法来表现它们的特征?

如是看重表征的作用,同时谨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这是我奉行的信条,其成败在于如何描绘各种表征与总体性(即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实践”)的关系。换言之,要想延用社会行为的已有概念,惟有同时承认表征世界不可简化作兀自封闭的体系和套式,也不能被当成“表意实践”。社会如同表征的战场,为了各自的领地和延传,种种表征在其间持久对抗,此消彼长。故而我们理由认为所有表征都必须接受一个较之更为基础的客观存在的检验,这个客观存在就是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是一个复杂的合体,常会超脱已有话语的限定;它是各种表征的交错重叠,也是它们在运用中的重新组编;它检验我们现有的各种范畴,使其巩固或遭瓦解;它制定或毁变一个概念,并消融特定语法的边界,令误读和隐喻不易区别。

(这一点涉及到大批图像,为了避免误读,还要有所补充——须知社会实践至少可经其大体的结构和倾向来进行分析)

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表征就是一个母体,其余各表征都贴着它来组织成形。个人的阶级状况如何,他对生产方式能否有效占有,都对社会生活有决定作用。但不是说光凭这些就能迅速判断一个人的宗教信仰、选举习惯、衣着品味、自我意识、审美取向和他

的性观念。它们分别体现在特点各异、相互分离的表征世界里,而这些表征世界又都受制于阶级关系这一决定因素,或为之侵扰,或被其束缚。互不相干的领域和圈落由阶级形势构架到一起,这在19世纪是显见易察的事,单看资产阶级的服装史就可以发现;还可以想想当时人借以区分自我和他者的各种手段,主宰其上的一律是市场经济的逻辑结构。正因为事实如此,我们才可能引入非经济的成分来扩充阶级的概念,以便于具体谈论资产阶级的娱乐形式和性生活。这样做我看没什么不妥,一来当时的参与者对它们的关系早有认识,二来如果不采取这种做法,新的探讨势必落入窠臼。但操作时须将尺度把握清楚,要警惕混淆之谬,比如有人一提到资产阶级的事,就说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本性”,其实两者只是有关联而已。这种清醒在考察19世纪资产阶级的对立方时会有必要,因为对象明显是一个处在形成之中的阶级,它的一系列特征都尚未发育完全,仅由当时措词之无定即可佐证这一状况,如people和prolétariat,又如classeslaborieuses和classeouvrière。

阶级问题无论搁哪都是个复杂事。说简单点,社会不可能只有一种生产方式,其构成常是新旧多种生产方式的糅合,故而阶级也是有新亦有旧,连同两者的结合体一起并存于世。本书旨在考察19世纪70年代的中小资产阶级,这个阶层的一个显著事实就是成员的大杂烩:其中一些人原可以靠自己的老行当在城市经济生活中赚得一点生活保障,现在大规模的工商业发达了,自己那点保障也顺势

被剥夺了去；而另一些人，像公司职员和商店助手这些，都是经济剧变一手打造的崭新角色，他们个个斗志满怀、心气慑人。不过，他们虽没有丧失地位的苦恼，可毕竟这社会体系还没能确定他们在新秩序中的地位高低，模糊的处境于是也带来不安的情绪。统称上述人群为中小资产阶级，不仅没有讹误，还能给现代人一个当头棒喝。这种归类引人关注历史的源头，使我们看清种种社会片段如何被垄断资本主义统归为一个整体——一个由多种多样的局部成分按规则构成的阶级整体。

意识形态的情况与此有点类似。我用意识形态一词来指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也可以说是各种“知的秩序”。它们以零零碎碎、千差万别的表征为载体，以话语情性为标志，它们是图像和信念的定式，是必须遵守的句法，也是观看和言说的一套标准模式；它们有专属的开合结构，也有自己的眼界见识和观念来源，并且据此将它们描绘成不可思议、逾规越矩或极端偏激的形象；而这些对抗又都在暗中进行，秘密斗争也是意识形态的另一特点。与知识形态相仿，意识形态也是一些观念模式，得意于独特而有限的社会实践，它们通常联系着一个特定阶级的心态和经历，对阶级外成员的心态和经历则有一定程度的敌视（这个表述须谨慎待之，实际上，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斗争锋口常有一种积极的对抗。19世纪的资产阶级总想主宰其他阶层，他们积极开展意识形态的斗争，力图颠覆和替代其他阶级的意识，但同时也有收容和接纳。对于这场难以回避的意识形态

态之争，当时咖啡音乐会的情景即可作为史证，而世人为定格娼妓形象所做的努力也是一个好例子）不过无论怎样，意识形态的功能总是尽量消除这些冲突的根源。意识形态将知识定为一套秩序，而非程序。但它并不承认这点，而是以特殊的结构和程序来掩盖这种倾向，所以图画和讲话的内在结构在它那里只是客观真实的赋予。或可说意识形态使表征变得自然，它建构意义，又留出争论的余地，仿佛给出的根本就不是意义，倒更像客观世界的本质形态，似乎观察者靠直觉即可有幸认识。

无论藏于表征过程之中，还是对其发生作用，意识形态都不应被单纯理解为一套图像、观念和“误读”。与它们不同，意识形态要更为本质，更加悠远；它其实是对话语的一套限定，还是一套矛盾、一套重复和一套循环；它借助这些特性封闭言语，以抵挡那些将它看成产品、过程、实践、存在或偶然的意识。这个过程好比大浪淘沙，我们无从料见它的终结。

相比之下，“景观”和“景观社会”的概念就不那么被容易理清和提炼了。这两个概念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属于“情境国际”组织的理论构建，体现了其成员试图将社会变迁的结果诉诸理论的追求。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生产逐渐转向消费品和服务的供给，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跟着遭遇了一场“殖民”。“殖民”这个词使人联想起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帝国主义”，此乃必然，因为这个概念直指资本主义市场内部的大规模扩张——它侵占并重构人们的闲暇时光、私人生活、娱乐休闲和个性表达，进而演变为一股前所未有的推动力，

催生出相对自由的城市无产阶级；它还象征了一个商品生产的新时代，昔日那些随意的日常生活，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都在这股商品化的大潮中步入市场，参与交易。

可见景观概念体现的只是一种尝试，既不全面也无终结。它用自己的理论聚合起一系列有差别的征状。这些征状在资产阶级社会学和左倾保守主义那里常被看成一鳞半爪，像消费主义和休闲社会这些，还有大众传媒的兴起、广告的扩张和官方娱乐的膨胀（奥运会、党会、双年展之类），都被认为是轻浅地附着旧有的经济秩序而已。情境主义者的研究方法以其眼光之新颖而渐趋流行，他们深切关注这种尝试在规范和更新个人日常生活时面临的或可能面临的危机；他们描述后资本主义社会对家庭效力的侵蚀，嘲讽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和精神疗法这些夺权的不速之客；他们笃信并强调这种尝试导致了日常生活的种种焦虑迹象：日趋严重的青少年问题、逐步蔓延的犯罪亚文化、渐成气候的临床抑郁症，以及城市里随处可见的种族歧视和环境恶化。可以说，景观之概念大致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修正资本主义的理论。情境主义者提出过许多概念，名声最盛的一个来自盖伊·德波，他说：“景观是资本逐渐积累而成的图像”，乍看来只是寻常一语，琢磨过便觉深沉意味。

T. J. 克拉克 (T. J. Clark)

美国著名艺术理论家、批评家

曹程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